

中國化與專業化： 基督教青年會與近代平民教育

——以廣州青年會為例

鄭利群

[提 要] 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曾在近代以來進行過兩種形式的平民教育事業活動，一是在 1920 年代推動了平民教育運動在全國的大規模展開，二是為失業青年創辦了勞工學校。本文對兩種平民教育形式的背景和內容進行了剖析，並從廣州青年會角度，探討了它們的具體實踐過程。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以平民教育形式展開的社會服務事業，本質上體現的是中國化與專業化的特徵，這也是廣州青年會成功的根本緣由。

[關鍵詞] 基督教青年會 廣州青年會 平民教育 勞工學校

[中圖分類號] B97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1-0095-10

基督教青年會是中國近代以來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宗教性團體，20 世紀 20 年代初，各城市青年會會所幾乎成為當地公眾意見之表達場所。^①它擁有完善的組織體制，並以“德智體群”四育等基本事業服務於社會。在其“智育”服務中，平民教育又曾佔據其重要一環，對中國社會產生過深刻而廣泛的影響。

對於中國青年會來說，平民教育在內容上以教導民眾識字為主，兼及教授失業青年的基本生存技能及公民知識。在青年會近代歷史實踐中，由其主導的平民教育主要通過兩種方式體現出來：一是在 20 年代的平民教育運動中，在晏陽初及其之後平民教育總會的指導與協作下，推動了這一運動在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展開；二是為失業青年辦理勞工學校，“培植一般成年失業工友智能，以適應社會需求。”^②

目前學界絕大部分人皆將平民教育與晏陽初相結合，尤其是以晏氏後來的鄉村實驗作為探討的主要內容，^③雖然有涉及平民教育源流與思潮的文章，但卻鮮於談及基督教青年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④甚至直接論述 20 年代中期的廣州平民教育運動，也是主要強調黨團與學生組織對此運動的領導作用。^⑤另一方面，在論及青年會與平民教育關係的文章中，有的偏向於晏陽初平民教育實踐的探討，然而卻將青年會與晏陽初混為一談；^⑥有些則又過於側重將平民學校或勞工學校作為青

年會平民教育措施之一的地方主義展示。^⑦本文主要從基督教青年會視角出發,通過對其在 20 世紀 20 年代推行全國性平教運動背景的分析,以及晏陽初與青年會關係的梳理,並以廣州青年會從事的平教實踐為地方性案例,來探討青年會進行平民教育事業的特點。

一、基督教青年會與平民教育運動

民國以降,中國社會發生了急劇變化,人們對世界的認識也發生了改變。基督教青年會作為以社會福音為理念的宗教性團體,對於中國數目龐大的文盲群體格外關注,並生出強烈變革之心。它通過晏陽初領導的平民教育科及其之後的中華平教總會^⑧,完成了全國性平民教育運動的試驗。廣州青年會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作為全國運動的一部分,在青年會全國協會以及平教總會的指導下,成為 20 世紀 20 年代當地平民教育運動高潮的重要推動者。

(一) 青年會社會福音理念與平民教育背景

基督教青年會作為從北美傳入中國的基督教團體,宗教上實行的是社會福音理念,這使社會關切成為其組織發展中的重要特點。社會福音思想起源於 19 世紀後期的美國,是在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中,基督教面臨大量增多的社會問題而創立的一種神學思潮。它在強調個人道德完美的基礎上,注重對社會的拯救,希望通過社會服務改造社會,進而逐步消除整個社會的罪惡。社會福音運動在一戰前夕達到了高潮,並通過 20 世紀前後美國的海外傳教運動,強烈地影響了傳教地所在國。^⑨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作為這一運動的產物,其在民國前期的迅速壯大,即與社會福音在中國的有力傳播有直接的關係。青年會注重個人靈性與社會服務的結合,這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中國基督教會以往偏重於個人福音的缺陷,使其與後者拉開了距離,^⑩更為重要的是,它作為一個社會團體,更傾向於採用實踐性手段去解決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民國初立,中國的教育雖然開始改革並取得了一些進步,然而絕大部分人卻依然無法享受到普及教育的基本權利。1916 年時,國家開始強調基礎教育,大量學校建立起來。不過在全國 8,900 萬適齡的上學兒童中,能夠接受各類公立學校教育者只有 400 萬,接受教會學校教育的學生 50 萬,所以絕大多數適齡人口仍然無法獲得基本教育,“那些年輕商販、城市無產階級以及所有的農村人口依然是文盲。”^⑪直到 20 年代,不識字群體仍佔全國總人口的 80% 以上。同時,青年會在其“德智體群”基本服務中,曾希望通過社會教育來開啟新風的演講一項,至 20 年代前後,已因“收效極大為社會所不可缺”,而被認為是青年會“效用最廣之智育事業”。^⑫然而,他們也越來越發現,無論青年會的演講多麼成功,其影響所致,也只是受過教育的人群。對於那些遠離教育資源的民眾,他們根本無力接受到青年會所要傳播的新知信息。可以說,青年會期望通過教育來改變社會的理想,在中國巨大的現實面前,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礙。

對此,中國青年會的看法是,正是由於大量的平民無法接受到基本教育,從而造成了一系列中國社會根本問題的發生:“吾國人民眾庶而識字者絕少,坐是知識閉塞,農工商各業,咸奄奄無生氣,長此不圖,將何以處二十世紀之世界。且自推翻君主號稱民治以來,軍閥施其暴力,政客煽其陰謀,地方自治,徒擁虛名,莫非劣董惡紳,勾結盤踞以魚肉良民。究其弊病之本根,則教育不普及為之大害。蓋惟教育不普及,則常識缺乏。常識缺乏,則各業有退而無進。雖有公民之權利而不克正當用之,循至無以舉民治之實在。”^⑬1922 年華盛頓會議關於中國“二十一條”的討論最終以無果而告終,曾以“國民代表”身份監督北京政府進行談判的中國青年會總幹事余日章對此倍感激憤。他“深感我國國事之岌危,皆由我國國民大多數不知公民應享之權利與應負之責任,至於今日,幾有

不可收拾之概”，¹⁴而其根本原因，又與國家大量文盲人口的存在有關。對此，中國青年會決意發起一場針對普通民眾的教育運動。

可以說，民初以來，中國教育的改進雖然已在蹣跚進行，然而在踐行社會福音理念的基督教青年會看來，其福澤卻遠未能惠及於普通民眾。其結果，從青年會方面講，大大縮小了其傳播新知識的範圍；從社會層面來看，也導致了中國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甚至直接造成了 20 年代華盛頓會議的失敗。而這一切，共同構成了青年會未來推行平民教育的根本緣由。

（二）以晏陽初為代表的青年會與平民教育經驗

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實現其平民教育的理想，最初主要是通過晏陽初的指導而開展起來的。正是由於晏陽初的加入，實現了二者間的優勢互補，終於促使全國性的平教運動得以轟轟烈烈地展開。

晏陽初的到來，其身上所具有的能力、經驗及品質，彌補了青年會欲在中國實行平民教育但卻缺乏人才的根本狀況。一戰期間，晏陽初作為留美學生被美國陸軍青年會招募派往法國，為當地的華人勞工服務。期間他研製出一套科學實用的千字文教材以及行之有效的學習方法，可以讓那些不識字者有意願學習，並帶動其他人在較短的時間裡達到基本閱讀書信的程度。這一帶有實驗性質的舉措在當時具有非凡的意義，因為它意味著通過節省校舍與師資，可以在短時間內填補因教育資源專業化不足所帶來的巨大鴻溝。¹⁵而晏陽初願為中國勞苦大眾服務的堅定信念，及其身上因東方文化背景與西方教育相結合，而“在生活中的理念與見解”上呈現出的“完全現代性”，¹⁶都讓青年會相信，他是可以讓青年會實現自己理想的最佳人選。“在所有可能的情況下，他都應該為青年會工作”。¹⁷因此，當晏陽初回國之後與余日章歷陳推行平民教育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大前提時，後者當即“建議晏即以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作推動這一平民教育運動的機構。”¹⁸

對於晏陽初來說，他之所以從西洋歸來選擇進入中國青年會，除了後者與其理念相同之外，更在於青年會在當時擁有中國任何其他機構所不具有的組織與會員優勢。20 年代前後，國內一些地區實際上已有通俗學校、平民學校和教育團體在進行平民教育活動，但基本上以失敗告終。晏陽初在仔細研究各地團體的平教實踐之後，認為失敗因素主要有三：一是教員無經驗，用教大學生的方式教目不識丁的人；二是無良好課本，犯了不能拿小學國文課本教平校學生的錯；三是無組織進行溝通，導致經驗無法交換，也不能明瞭各自優劣所在。其中，除了前二者之外，青年會以其優勢滿足了第三點也是國內團體最難做到的不足。1920 年，青年會在中國的發展勢頭正盛，它在國內各大都市皆有自己的團體，在全國已經擁有近四萬二千名會員，¹⁹會費及捐款近 50 萬銀元，而且各地組織音聲相通，管理完備。另外青年會會員中，很多人受過西方化教育，屬近代新興顯貴階層，掌握著當地重要的社會資源，富於社會影響力。因此，儘管晏陽初一度想在人情習俗皆諳的家鄉華西地區開展平民教育事業，但他很快放棄了原初設想，決定加入到余日章的中國青年會中，並以其為基礎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平民教育運動。²⁰

1920 年，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正式成立平民教育科，聘請晏陽初和同為在法華工服務的傅若愚為正副主任，指導和襄助城市青年會與學校青年會開展平教運動。晏陽初和傅若愚根據研究以往華工服務之經驗，以及中國廣大環境下各類群體需要之不同，重新編寫了四本《平民千字課》，同時以圖畫相佐，決定通過平民學校和讀書處兩種形式來幫助受教育者在四個月內習完四冊課程。此外，他們又研究了如何推廣平民教育、如何招生、如何組織平民學校，甚至如何管理、如何鼓勵學生等等問題，都得出了相應的結論。²¹之後，青年會開始用兩年的時間，通過選取長沙、煙台、嘉興和

杭州四個地區不同、發展各異的城市來推行大規模平民教育試驗，以取得多種不同的經驗。此次試驗取得了極大成功，參加者的人均及格率達 68.8%。同時，以社會運動的方式去進行平民教育自有其獨特的優勢，因為它能“以最少數教員，來教授最多數不識字人”。^②平教實驗的成功給了青年會以及很多教育家以極大的鼓舞，它直接促成了後來中華平教總會這一全國性專業機構的產生。由於平教事業宏偉繁巨，晏陽初不得不退出青年會，專任平教會總幹事一職。之後，平教總會制定出《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組織大綱》，規定了一系列的專業化方法，並於 1924 年以青年會為各地組織基礎，將平民教育事業推進到全國性的運動高潮。

（三）廣州青年會與當地平教運動實踐

1924 年在全國舉行的大規模平教運動，依據各地情勢，有些由青年會單獨主持，有些則為青年會與平教會合作辦理。在其中屬較大運動的市會中，共有南京、上海、武漢等 21 家，而若論佼佼者，則又以廣州為辦理事業最大的城市之一。^③

廣州平教運動的推行，主要是以中華青年會平教試驗所取得的成功經驗為模式，通過與當地平教會合作，並聯合政府與教育界力量，採取半政府半社會的大規模運動方式來進行。

1924 年 2 月，由身為青年會會員的政府官員組成的“廣州市平民教育運動委員會”成立，並聘請青年會學生童子部主任李應林為主任幹事，麥登銘和黃仁讓為助理幹事，統理運動的實行。隨後包括高等師範學校等近 20 所學校亦參與進來，共行平教大業。經多方商議，廣州平教運動由兩部分分別進行：一為平民識字部，其內容為每日授課一小時，四個月畢業，以教識常用字一千個為目標；一是平民義學部，內容為每日授課兩小時，一年畢業，主要教授公民常識、珠算等課程，以便於習者謀生。

4 月 21 日，在廣東省長楊滄白、廣州市長孫科等政府要人及社會各界領袖帶領下，平教會舉行了一萬多人的市民大會和勸學大遊行。同時廣州市政廳出示佈告，宣佈“查本市平民教育運動之組織，係為利便一般失學之人，就近入校，以期成普及教育起見，辦法至為良美。所有市內失學兒童、或不在學齡內之青年，均應遵照勸學隊勸導，分別送校肄業，以期同受教育。……合函佈告，仰市民人等一體遵照勿違”云云。^④

之後，平教運動通過兩部分同時展開，一是依靠正規學校組織來有序進行，二是通過設立讀書處發動社會力量自主辦學。由教育界參與的正規學校辦學，主要由前面提及的平民識字和平民義學兩類學校進行。平教會主要依據各個學校在運動中的不同職能分為六股，分別負責其中的招生、校址、教員、儀器、廣告和教學等六大方面。由於平教會及教育界團體以基督教組織為多，出於宗教的道德考量，作為每位成為教員的志願者，他們還被要求簽具“平民識字學校教員志願書”，以保證教學的完好執行。^⑤另外，鑒於城市人多居住分散，尤其平校有時間紀律等諸多要求，而使許多忙於生計之人無法如願去校讀書，平教會又發動起民間力量，提倡有能力者自設讀書處。其中，平教會負責訂立讀書處建立的標準與程序，提供統一的教材以及教學方法上的指導，並進行總體上的管理，其他實施過程則交由社會來自行辦理。^⑥與全國其他城市一樣，平民教育以四個月為一期，一期結束後，須由平教會統一舉行考試，合格者即發給識字國民文憑一張。

儘管目前學界對這場全國性的平教運動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以晏陽初最初所試驗的城市成績為標準看，廣州的平教運動是取得了很大成功的。關於 1924 年廣州的平教運動，當時有人以為是失敗的，認為“曠課與中途退學者總在五分之三以上”，而且“經費缺乏，各教場書籍筆墨等均無供應。”^⑦後來的學者也認為，這場大規模的全國性運動，其最終識字的長期效果如何，實在不得而

知。²⁸不過若將其與最初的預期相比,相差並不很多。²⁹據相關資料統計,廣州平教運動中及格畢業的人數達 2,200 多人,及格率為 73.3%。³⁰考慮到前面提及平教開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此數字當是將專業化的平校成績與社會化的讀書處成績共同相加得來的結果。如果將這一結果與晏陽初最初試點的四個城市相比,則廣州無論就人數還是成績來說都是很高的。³¹至於對此次民眾識字是否達到長期有效性的說法,如若“考慮到識字對於城市居民的重要性遠超過農民,其中相當部分人從此摘掉文盲帽子是完全有可能的”,³²則在廣州這樣一個以商貿為主,對識字需求較強的城市,此次運動取得成績的有效度應該還是比較高的。

總體上看,20 世紀 20 年代,基督教青年會認識到中國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於大量基礎教育無法普及,而解決之道則在於推行平民教育事業。正是在此背景下,以晏陽初為代表的中國青年會通過一系列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並通過與之後成立的平教總會的結合,推動了各地青年會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大規模平民教育運動。而廣州青年會也正是在青年會全國協會及平教總會的領導與指導下,通過與公共權力以及相關教育組織的合作,推動了此次平教運動的成功。

二、廣州青年會與勞工學校

勞工學校屬平教運動之後在城市繼續發展的一種平民學校,也是在 20 世紀中期民族主義高漲的形勢下,基督教青年會為社會失業青少年舉辦的另一種平民教育方式。

(一) 勞工學校創立的背景

廣州青年會勞工學校的創立,既是平民教育內在發展的需要,又是 20 世紀 20 年代勞工運動與非基督教學生運動共同促成的結果,而五卅民族主義高潮的到來,最終加速了勞工學校的建立。

勞工學校的建立,從內部來看,是平民教育發展需要帶來的結果。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認為,平民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人做有知識力、生產力和公德心的“整個的人”,而與此相對應的三種教育形式則為識字教育、生計教育與公民教育。三者之中,識字教育只是平民教育的第一個階段;生計教育作為第二階段,其目的是“使人人具備生產的技能,造成自立的國民”;最後,所培養之人還需要對國家社會的前途有利,而非“不顧國家社會的禍福利害”,此即公民教育。³³這三種教育之中,後兩種教育是無法依靠短時期的大規模運動來完成的,它只能通過平民學校的繼續教育才能實現。平教總會的這一指導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青年會在各地的平民教育實踐,各地城市青年會皆根據自身條件創辦起多種課程的勞工學校,來作為平民教育措施的延伸與發展。

從外部環境看,20 世紀 20 年代勞工、非基督教學生與民族主義運動,共同導致了勞工學校的建立。

清末民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了 20 世紀 20 年代,使得勞工問題逐漸“成為現代社會中的一個重大而迫切的問題”。³⁴越來越多的勞工受到五四以來新思想的刺激,意識到自己長久以來低下薪金和悲慘工作的狀態,開始組成各種團體進行集體罷工,³⁵僅僅 20 年代前五、六年,罷工風潮就達幾百次之多。³⁶由於基督教青年會的歷史,無論是其最初成立於 1844 年的英國,還是後來發展於 19 世紀下半葉的美國,都是一直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不斷地面對社會問題出現的過程,這也讓來自於西方母體的中國青年會,對因工業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本能地加以關心,並試圖提出方案加以解決。青年會認為,“每有一次罷工罷業之風潮發生,不特雇主與工人,雙方大受損失,即全社會之幸福,亦為其減損不少。……保障工業界之安寧,實為社會公共之責任。此青年會所以毅然以改善工業狀況自任,而望社會協力匡助者也。”³⁷

另一方面,20年代初源於學生團體的非基督教運動,也讓基督教青年會處於風口浪尖之上。五四以來,由於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的增強,使得1922年世界基督教同盟第十一屆大會在中國召開這一事件,成為非基督教運動的導火索。青年學生發起了反對基督教的運動,並迅速得到全國學生和知識界的響應。隨著北伐戰爭的向北推進,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反教暴力事件,教會財產、傳教士以及青年會都受到了巨大的衝擊。1925年全國學聯代表大會在“反基督教運動議決案”中,即認為青年會是利用“設立平民學校實行傳教以蒙蔽青年政治思想,妨礙愛國運動”。^③廣州青年會也因為西方化的宗教背景,被很多愛國青年高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基督教”的口號而受到衝擊。故此,1926年全國大會曾總結道:“原攻殲者之目的,大部分固屬教會,而青年會既冠以基督教之名,當然在被攻殲之列;非但不可倖免,而且首當其衝。”^④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加速了中國青年會幹事們的深刻反思,並決定將其服務擴大至非會員階層。1925年日本紗廠槍殺中國工人的事件,不僅最終上升為一場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也將20年代以來的勞工及非基督教問題與民族主義緊密地糾連一起。在這一激烈情勢下,1925年7月中華青年會第二屆總幹事大會在上海緊急召開,專門就各地形勢討論應對措施。大會認為,在此次風暴中,“青年會應明確表示態度,輔助社會,發起各種事業,不再如往日之專為青年會自身謀”,^⑤而勞工運動與學生運動則是最需要青年會密切關注的部分。會上甚至有人認為議案中關於“此後工作應注重學校青年及勞工”的政策過於偏激,而忽略了青年會本應服務的會員。^⑥雖說這一內部看法並未獲得通過,但卻表明,20年代中期的這場民族主義風暴,已經讓中華青年會幹事們對於時局有了深刻的反思,即青年會以往對於會員以外的群體關注遠為不夠,為了青年會的長遠發展,當前時局下,勞工與學生群體應為首先服務的對象。

正是在平民教育的內在發展與中國勞工運動、非基督教學生運動以及民族主義形勢的交互激蕩下,應全國協會的要求,廣州青年會勞工學校於1926年創辦起來。正如廣州青年會自己所言:“本校創立之初,正當革命空氣澎湃之時,勞工問題,極其重要,本校為應社會之需求,毅然瓶立,其旨無非以為有可為勞工服務之處,本我基督教青年會為社會服務之精神,願盡主力而付之耳。”^⑦

(二) 勞工學校創辦的特點

廣州青年會創辦的勞工學校在青年會舉辦的正規學校教育中,為“義務性質,不收學費,內容科目,注重簡易實用,同時並輔以種種事業以陶冶其人格。一年半畢業。”^⑧雖然勞工學校只是廣州青年會學校教育的一種義務補充,然而,青年會對其卻無絲毫的輕視,反而教務要求極為慎密嚴格。

課程設置方面,採取平教會的原則。與前述平教運動中僅僅教授基本識字的單一技能不同,勞工學校課程確立的原則是:“一切不切實用之科學,概行不採,務令節省時間,並符‘學以致用’之旨。”^⑨其目的是使學生畢業後具有如下最低限度的社會化條件:(1)能運用文言白話作文章及來往尺牘,並能自由閱讀較深之文字;(2)能運用筆算珠算在商業上計算數目、記帳;(3)能明瞭社會普通常識,商業大勢;(4)能有純正之德行、活潑之精神及做事之效能,並能正確瞭解一己之責任。很顯然,這些課程設置的目標中不僅包含了平民教育應涵括的識字、生計與公民的內容,其最後一條更是體現了青年會講求基督教“德育”為本的精神品性。

招生條件方面,實行寬進政策。“寬進”是指通過設立較低的教育門檻,讓很多有心無力者可以邁進學校大門,以此來體現平民教育的基本理念。對於勞工學校來說,其對入校學生的要求只有兩條:一是年齡,二是心性。關於入校生的年齡,學校曾有過調整,從最初的14歲最終改為之後的16歲;關於心性,學校也是從最初單一的“有心讀書”到加上“品性端正”的條件。雖說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入校門檻,但卻保證了學校教育秩序的正常開展,也體現了寬進政策的核心精神,即維護每一個受教育者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

教學標準方面,提出明確的目標。勞工學校的教學標準主要通過不同課程的教學目標體現出來。對於青年會來說,教學目標不僅對教師教學具有指導性作用,它還是向社會呈現成果並獲得支持的具體依據。勞工義校對學生每一班的課程都制定了標準,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課程具體目標、授課時數、教學方法。即使同一科目,處於甲乙丙班之不同級別,標準也相異。以信札科目甲級為例:(1)養成運用白話文文言文之寫信技能,商業及人情往來尺牘雙方兼顧;(2)每週授課二小時;(3)注重講解文義,寫信格式,及習作。

教學管理方面,通過獎懲手段來促其學習。勞工學校依據不同學生知識程度的差異,將其分為甲乙丙三個等級的班,並為每一級的科目制定了相應的教學目標和教學方法,規定學生只有通過了要求才能進行升級。而獎懲措施,也是通過設立標準,讓學生向規範靠近。學校規定,“凡學生在校成績特別優異者,可准予跳級,或予以相當獎勵。凡於一學期中任何一科缺席時數逾該科目全學期授課總時數五分之一者,不得參與該科之學期試驗。”⁴⁵此外,學校還利用遲還一元保證金的經濟做法,對那些“中途退學或犯規被逐者”以加強其學習上的動力。

課餘方面,鼓勵學生舉辦多種校園活動。與我國傳統教育中對課外活動的忽視不同,中國青年會向來提倡群育,鼓勵青少年結成各類組織,以此互相砥礪,豐富人生經驗。勞工學校鼓勵學生組織各種社團活動,刊辦壁報和月報,自辦各種豐富多彩的活動。同時助其擴大橫向聯繫,與職工夜學舉辦聯誼活動,成立自己的校友會。通過自辦組織與各種活動,學生們不僅豐富了生活,發展了個性,尤其是養成了自主辦事的能力,為其日後更好地融入社會創設了有利條件。學生走出學校之後,“對母校方面每多愛護,在畢業生方面,……尤樂任公益事業,達己達人,每於其各種活動上見之。”⁴⁶其緣由,皆因社團組織養成的綜合素質,以及青年會通過宗教長期化育的結果。

由於廣州青年會自成立以來,學校教育就一直是其“智育”服務的主要內容,青年會對其具有豐富的培養與管理經驗,因此勞工學校的創辦,實際上是青年會辦理學校教育的一種專業化延伸,只不過在招收對象以及教學的細節設置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變。

(三)勞工學校辦校的成果

廣州青年會舉辦的勞工學校,由於辦學質量高,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與支持。

廣州青年會勞工學校因其能滿足社會的需求而聲譽日隆,事業也得到快速的拓展。勞工學校初辦之時,適逢勞工運動的高潮,很多工會都為自己子弟設立了學校,只是數目並不多。雖然1927年政府又設立一所市立貧民子女學校,但與1925年廣東失學兒童將近280萬相比,遠遠無法滿足勞工子弟的需要。⁴⁷因此,青年會所辦的勞工學校,“因學科上管教上均能貼切就業者之需求,故來校讀書,獲益至易,而就學者亦甚踴躍”⁴⁸。隨著20年代末早期工會學校的先後停辦,青年會勞工學校更加成為社會貧寒子弟就讀的熱門之選,多年以來學校因教室所限每年僅招生100人,然而報名人數一直在300~400人之間,這導致學校1932年時不得不擴建校舍,以滿足更多的社會需要。至1934年時,學校甚至已經尋求在廣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建立分校了。

青年會勞工學校的高質量辦學,尚體現於其對學生畢業條件的嚴格把關上。勞工學校對於在校學生的畢業條件一直有嚴格的規定:“凡在本校甲班修業期滿,各科成績合格者(畢業班期考以70分為及格),即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⁴⁹換言之,每個進校讀書的學生只有進入到甲乙丙三級水平中的最高級甲級班,並通過以70分為基準線的考試,才能順利拿到畢業證書。這一“嚴

出”政策,無疑大大增強了學生的就業能力。1934年勞工學校曾對歷年的畢業生進行統計,認為學生“多能本其所學出而問世,在其職業上均有顯明之進步。以現日言之,由機關雜役升為科員者有之,由學校校役升為職員者有之,由商店夥伴升為店員、司理者亦有之,間中有因家庭經濟略為充裕,考入本市初中,及職業學校者亦得如願以償,得蒙取錄。”⁵⁰很顯然,由於畢業生水平的提高,導致一個直接的後果,就是他們進入社會後個人的生存狀況明顯得以改善。

總體上看,20世紀20年代,受到勞工問題及非基督教學生運動,尤其是民族主義高漲情勢的影響,作為早期平民教育運動的一種後續形式,廣州青年會在全國協會的政策建議下,創辦了以青少年失業勞工為主的勞工學校,並通過實用的課程設置、明確的教學標準、寬進而嚴格的教學管理以及對學生社團組織的建立,取得了良好的成績,從而獲得了社會的讚譽與廣泛支持。

三、結語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社會風雲變幻,以勞工運動、非基督教學生運動與民族主義為主的各種風潮洶湧不已。一方面由於國力不濟,大量基本公共服務無法實行,很多事業不得不由社會團體承擔下來,以社會服務的形式來進行;另一方面,中國青年會“無論對於本身地位,社會事工、宗教信仰、國事民生,俱已發生根本的新覺悟”,⁵¹其社會服務政策也做出了巨大的調整與改變。平民教育事業即是青年會為適應時代潮流而推出的一項重要社會服務事工。從青年會的事工角度來說,它包括兩大部分,一是1924年推行的全國性平民教育運動,二是之後在各地建立的規模雖小但卻穩定的勞工學校。

通過對前述兩種不同平民教育事業方式的探討,可以看出二者所具有的共同特點:

從背景來說,這兩種平民教育事業方式都是基督教青年會徹底中國化的結果。無論是平教運動還是勞工學校,其根本背景,都是青年會面對3.2億國人無法接受教育這一現實處境而推行社會服務的產物。從平教運動來講,其發起的直接動力來自於華盛頓會議的刺激,青年會認為在有民國無國民的情勢下,只有提升國民基本教育水平,才可以造就有未來責任有義務的公民。從勞工學校來看,其創立的直接緣由來自於民族主義浪潮之下勞工與學生運動的興盛,青年會認為只有擴大其服務對象,從以往對會員為主的服務擴展至為青少年勞工界的服務,才能重新換回社會的支持與擁護。我們固然可以說,青年會的政策含有無奈之舉,但也可以理解為是對中國現實及在新形勢下的一種積極回應。只有全然地面對當下中國的境遇,解決中國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基督教青年會這一西來團體在中國的發展才有更為廣闊的空間。

從過程來看,基督教青年會所從事的平民教育事業,皆展現了這一組織實踐過程中的專業化特徵。專業化作為工業化社會以來的重要特徵之一,在社會服務中,主要體現為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員,為服務對象提供持續性的需求。基督教青年會舉辦平民教育運動的成功,從橫向來說是借助了國家公共權力支持的結果,而從依賴的專業資源來看,則是得到了以晏陽初為主的中國青年會的成熟經驗,從而進行全國指導所取得的成就。只是鑒於青年會平時以四育事業為基本的程序要求,它對平教運動的開展只能實行暫時性的推動,無力也不可能成為國家公共服務的持續替代者。而勞工學校的設立,由於是青年會學校在自己可控範圍內進行的平民教育事工,故此較為完全地體現了教育專業化特點。勞工學校從招生、培養到管理,無處不體現出專業教育者對於失業勞工青年提供持續性幫助這一特點。因此,大規模的平教運動雖然難以為繼,然而勞工學校卻作為一種小型而穩定有序的延伸,填補了之前平民教育運動帶來的不足。可以說,大規模暫時性的平教運動與小

規模持續性的勞工學校,都以其專業化的服務,有力地推動了平民教育事業的高效開展,並獲得了社會廣泛的讚譽與支持。

在對宗教性團體進行研究時,具有社會功能的社會服務,因其具有最易顯化的勢能與效益,值得深入探討。而從基督教青年會對平民教育事業所做的貢獻,又可以瞭解到其在 20 世紀 20 年代順利轉型的重要因素,是社會服務中所體現出的中國化與專業化特徵。它使得基督教青年會安然度過了危機四伏的年代,並因能急社會之所急,且極富成效,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的需求,同時得到了民眾的讚譽與支持。應該說,廣州青年會通過近代以平民教育形式所展開社會服務而體現出來的中國化及專業化特點,為我們探討宗教性團體在中國的發展模式,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良好範例。

-
- ①梁曉初:《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五十年簡史》,《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五十周年紀念冊(1885-1935)》,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35年,第96頁。
- ②下文簡稱為“平教總會”,地方則簡稱為“平教會”。
- ③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勞工夜校招生》,廣州:《廣州青年》,1928年,第15卷15號。
- ④如周逸先:《晏陽初平民教育與鄉村改造方法論初探》,北京:《高等師範教育研究》,2002年第5期;徐秀麗:《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掃盲運動的歷史考察》,北京:《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1期;朱啟臻:《晏陽初平民教育實踐對現代農民教育的啟示》,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01年第9期;張國強、鍾非辰:《試論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運動》,呼和浩特:《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第12期;趙玉霞:《論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運動》,濟南:《山東師大學報》,1997年第2期,等等。
- ⑤如桑東華:《五四平民教育思潮的演變、分化和發展》,福州:《黨史研究與教學》,2004年第4期;楊東平:《平民教育的流變和當代發展》,北京:《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8年第6期;陳爾傑:《民國北京“平民教育”的淵源與興起(1912-1920)》,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等等。
- ⑥卜穗文:《1925年至1927年的廣州平民教育運動》,廣州:《廣東史志》,1998年第5期;《新學生社與大革命時期廣州平民教育運動》,廣州:《廣州文博》,2007年第12期。
- ⑦如姚二剛:《論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對平民教育的促進作用》,北京:《全國商情(理論研究)》,2009年第12期。
- ⑧如齊君、馮鑫:《淺論近代天津青年會的平民教育運動》,南寧:《傳承》,2008年第7期;鄭利群:《從20年代廣州平民教育運動高潮看基督教青年會的推動作用》,廣州:《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
- ⑨邢軍:《革命之火的洗禮:美國社會福音和中國基督教青年會(1919-1937)》,趙曉陽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5頁。
- ⑩中國教會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也深受社會福音影響,不斷對其發表自己的立場。見王京強:《社會福音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傳播探析》,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6期。
- ⑪⑬⑭⑮ Shirley Garrett, *Social Reforms in Urban China-The Y.M.C.A. 1895-192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50; p. 154; pp. 157-158.
- ⑫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智育事業》,《青年會第三次幹事會報告》,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19年,第48頁。
- ⑬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3年,第14頁。
- ⑭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十次全國大會全國協會報告書》,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6年,第44頁。
- ⑯ Clark Brookman, *The Greatest Volunteer Educational Movement in History*, 1924, p. 1, Box 95,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⑰ C. Brookman, Letter to Mr. Fletcher July 7, 1920, Box 95,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
- ⑱⑲⑳ 吳相湘:《海外名家名作 晏陽初傳——為全

球鄉村改造奮鬥六十年》，長沙：岳麓書社，2001年，第29~30頁；第30頁；第41頁。

①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民國十年份中華基督教城市青年會成績統計表》，《民國十年份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報告》，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1年，附件。

②③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十一屆全國大會全國協會報告書》，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9年，第31頁。

④④《平民教育運動市民大會及勸學巡行情形》，《第二號通告 平民教育運動》，1924年，廣州：廣東省檔案館藏，第3頁。

⑤⑤《平民識字學校教員志願書》，《第二號通告 平民教育運動》，廣州：廣東省檔案館藏，第9頁。

⑥⑥具體做法，參見鄭利群：《從20年代廣州平民教育運動高潮看基督教青年會的推動作用》。

⑦⑦郭壽華：《廣東平民教育運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廣州：《廣東青年》，1926年第2期。轉引自卜穗文《1925年至1927年的廣州平民教育運動》。

⑧⑧徐秀麗：《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掃盲運動的歷史考察》。

⑨⑨具體來說，就是識字學校預招10個班的1,000人，但因報名人多擴招至30個班的3,000人，而義學學校預招10個班1,000人，結果招至13個班的1,300人。而之後即便有3/5的人數回落，最終也有1,720人堅持下來，與原定報名的2,000人相差僅14%。參見鄭利群《從20年代廣州平民教育運動高潮看基督教青年會的推動作用》。

⑩⑩文史資料編輯部：《廣州近百年教育史料 廣州文史資料專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8頁。

⑪⑪否則就不會有全國協會進行統計時，將廣州作為全國辦理事業最大城市之一來評價了。

⑫⑫宋恩榮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晏陽初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0、52頁。

⑬⑬駱傳華：《今日中國勞工問題》，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3年，序1。

⑭⑭Miss W. T. Zung, *Modern Industry in China*, 1923, p. 3. *International Works in China*, Box 94,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

⑮⑮朱懋澄：《中國今日之工業狀況和勞動運動》，《青年進步》，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6年3月。

⑯⑯朱懋澄：《宣言：中國之勞動問題與青年會職工事業之宗旨大綱》，《青年進步》（職工號），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2年11月。

⑰⑰李卓吾：《反基督教運動的研究》，唐曉峰、王帥編：《民國時期非基督教運動重要文獻彙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451頁。

⑱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青年會三年來進步之趨勢》，《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十次全國大會全國協會報告書》，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6年，第6頁。

⑲⑲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國中特殊勢力之觀察》，《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二屆全國總幹事會議記錄》，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5年7月，第39頁。

⑳⑳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二屆全國總幹事會議記錄》，第71頁。

㉑㉑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專此奉告》，《勞工學校日特刊》，廣州：廣州基督教青年會，1934年5月5日。

㉒㉒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勞工義務學校》，《百年樹人》，廣州：廣州基督教青年會，1933年，第19頁。

㉓㉓廣州基督教青年會：《略述本校教務的狀況》，《勞工學校日特刊》，廣州：廣州基督教青年會，1934年5月5日。

㉔㉔《廣州市教育局十六年份施政經過概況》，廣州：《廣州市教育局第三期報告書》，無年份，第46頁。

㉕㉕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本會勞工夜校招生》，《廣州青年》，廣州：廣州基督教青年會，1930年，第17卷26號。

㉖㉖任夫：《十年來吾國青年會之重大變化》，《青年進步·十年百冊紀念特號》，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7年2月，第243頁。

作者簡介：鄭利群，暨南大學歷史學系講師，博士。廣州 510632

[責任編輯 陳志雄]